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龚云 孟虹

〔摘要〕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区域发展差异显著等现实背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因地制宜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法论,蕴含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与时代要求。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整体提升、区域分化、结构转型的特征,同时面临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创新链条结构性断裂、要素跨区域流动壁垒突出、产业布局同质化等现实困境。培育新质生产力应坚守立足实际、新旧统筹、底线思维三大科学方法,通过构建分级分类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健全分类施策的“两新”深度融合机制、加强跨区域要素交易市场建设、实施差异化考核与分类指导等路径,推动形成各具特色、协同共进的区域创新格局,使“因地制宜”从政策原则上升为可操作的分类实践框架,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防范同质化竞争、完善新质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 因地制宜 新质生产力 区域发展 科技创新

JEL分类号: B14 O30 R10

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性部署,贯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迫切需要以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时,我国地域广阔、区域差异显著,简单划一的发展模式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立足“十五五”时期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深刻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战略意义与实践路径。

* 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孟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7月版,第195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版,第10页。

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和内涵

因地制宜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法，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正确理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与科学内涵，可以从“为何要因地制宜”与“因地制宜是什么”两个方面展开。

（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

第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形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生产力发展必须适配具体的社会生产条件，脱离实际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破了“一刀切”的发展误区，让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贴合各地发展基础，是将这一理论与我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差异显著，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也应各有侧重。只有立足本地实际、分类施策，才能让新质生产力真正融入区域发展，破解发展瓶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精准动力。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破解区域同质化发展的迫切需求。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是让各地区实现错位发展、协同发展，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抓手。东部地区技术、人才、资金集聚，可重点发展前沿技术和高端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要素成本较低，可聚焦特色产业升级，推动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欠发达地区则可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可以使各地区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让新质生产力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第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激发区域内生动力的关键举措。区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内生动力的培育。培育内生动力需充分调动本地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必须立足区域自身实际，否则无法真正激活区域发展的内在潜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是让各地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找准新质生产力与本地发展的结合点，培育具有本地特色的创新主体和产业形态，避免资源浪费。这种贴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模式，能够充分激发本地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形成“因地制宜、各具特色、自主发展”的良好格局，推动区域发展从被动追赶向主动引领转变。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其核心内涵来看，在于遵循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客观规律，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技术集群结构与产业基础的异质性，通过差异化的数智技术路径与政策供给，实现区域技术集群结构与新质生产力布局的精准耦合与协同演进（任保平和陈婧文，2026）。对这一内涵的理论阐释，可从唯物辩证法和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两个层面展开。

首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具体运用。因地制宜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具体运用,核心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指立足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即发展实践必须以充分调研、把握区域经济的客观条件为基础,不违背规律、不脱离现实。“地”指不同区域在自然条件、发展基础、约束条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决定了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能采用统一模板,必须实现差异化发展。“制”指根据客观实际和区域差异主动制定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宜”则要求所制定的策略必须与区域客观实际相适配、与生产力发展规律相契合、与区域发展需求相匹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看,因地制宜深刻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普遍规律与共同要求,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约束条件、比较优势各不相同,构成矛盾的特殊性。因地制宜正是要求在遵循全国统一战略部署、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区域发展的特殊矛盾,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现共性要求与个性特征的有机结合。同时,因地制宜蕴含着系统观念与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思想,要求既立足地方实际、找准自身发展路径,又树立全局观念,在全国一盘棋中发挥应有作用,妥善处理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其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守正创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义。新质生产力是通过新型劳动者改造新型劳动对象而产生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摆脱了既往发展路径依赖,又能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形成适配当地的生产力形态,推动生产力在新阶段呈现新质态,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当代实践。此外,顺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兴起,传统生产关系在要素配置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不适应性逐步显现。新型生产关系通过优化体制机制、完善分配结构、创新组织模式,本质上是对传统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基本原理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它既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引。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基础

生产力布局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呈现,也是国家战略的主动塑造。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呈现“整体提升、区域分化、结构转型、主体活跃但不均衡”的总体特征。系统考察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演进规律,准确把握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特征与深层困境,是因地制宜从政策走向实践的认识论前提。

（一）我国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历史演进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蕴含着生产力空间布局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世界历史来看,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从来不是均衡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轫于英国西北部,随后向欧洲大陆和北美扩散,形成了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生产力发展的梯度差序。资本积累总是趋向于利润率最高的部门与地区,这种不均衡分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生产力水平和空间格局的变化是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持续深化的必然选择(阮一帆和王智博,2025),蒸汽时代催生了沿煤铁资源带布局的工业区,电力时代推动了沿交通干线集聚的城市群,信息时代则孕育了沿创新网络分布的科技走廊。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推动生产力布局从“资源导向”向“创新导向”转变,为不同区域依托自身条件实现差异化发展提供历史性机遇。

从中国实践来看,生产力布局始终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工业偏集沿海的不合理格局,国家通过“三线建设”等重大战略将生产力向中西部内陆转移,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从东部沿海率先发展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再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我国生产力布局经历了从“均衡布局”到“非均衡布局”再到“协调发展”的演进轨迹。这表明,生产力的空间布局既受制于资源、技术和市场,也离不开国家战略的主动调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在把握生产力空间布局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回应。

历史地看,因地制宜不是对“一刀切”的简单否定,而是对生产力空间布局规律的深刻把握——既承认区域差异的客观存在,又强调通过分类施策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共进。这一方法论既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二）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现状

1. 地区层面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区域差距较为显著。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中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则相对滞后,且区域差距逐渐扩大(纪玉俊等,2024)。东部地区作为创新要素密集型区域,在高端人才、前沿技术、金融资本及数据要素等方面具有显著先发优势。2024年北京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达6.58%,技术市场成交额9153.3亿元,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占全国22.6%,深圳上市高新技术企业334家,位居全国城市第一^①。

^① 数据来源:《2024年北京市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https://www.beijing.gov.cn/gongkai/shuju/sjjd/202510/t20251023_4236947.html;《2024北京技术市场统计年报》, https://kw.beijing.gov.cn/zwgk/sjfb/jsscsj/tjnb/202512/t20251223_4357829.html。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初步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范式。

中部及东北地区属于产业基础雄厚型区域,制造业体系完整、劳动力资源丰富,发展态势稳中有进。2024 年河南全社会 R&D 经费达 1275.1 亿元,安徽五年间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增长近 5 倍,吉林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 12.2%,黑龙江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达 69 家^①。中部及东北地区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创新能力不足与高端要素短缺仍是制约因素。

西部地区属于资源富集型区域,风能、太阳能及水资源等清洁能源优势突出。2024 年贵州、甘肃研发经费分别达 231.1 亿元和 164.6 亿元,分别增长 9.3% 和 5.38%,陕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 75.51%^②。西部总体比较优势在于新型劳动对象,如不可移动的自然禀赋,其新质生产力路径应不同于东部,重点在于将清洁能源、特色资源转化为可交易的经济价值,而非盲目复制东部的创新模式。

差异性区域格局是资本积累的空间不平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表现。发达地区的高资本有机构成与后发地区的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差距,既是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体现,也是需要国家自觉调节的对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在尊重这一资源不平衡现实的前提下,通过分类施策防止差距无限扩大。

2. 产业层面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但传统制造业仍占据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地位。新兴产业主要包括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技术制造业等具有“三新”经济特征的产业形态,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前沿方向;传统产业一般指除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以外的制造业,涵盖能源加工、轻工纺织、金属冶炼、通用设备等门类,是我国产业体系的基底。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及《数字中国发展报告》近五年数据,2020 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11.7%,2025 年超过 17%,增幅达 45.3%,呈现快速攀升态势,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增长尤为突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2020 年的 7.8% 升至 2025 年的 10.5% 以上,增幅为 34.6%,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中“迈向全面扩展期、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的目标;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从 2020 年的 15.3% 上升至 2025 年的 17.1%,增幅为 11.7%。传统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从 2020 年的 84.7% 下降至 2025 年的 80% 左右,呈现出缓慢收缩但总量庞大的发展态势,其产值规模、就业吸纳和产业链配套

① 数据来源:《2024 年河南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https://tjj.henan.gov.cn/2025/10-24/3237855.html>;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杨仑(2025),《吉林:让科创‘关键变量’转化为发展‘最大增量’》,《科技日报》,2025 年 2 月 18 日第 3 版;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官方网站。

② 数据来源:《贵州省 2024 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https://stjj.guizhou.gov.cn/tjsj/tjfbjyjd/202510/t20251031_88891019.html;甘肃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陕西省科学技术厅官方网站。

能力仍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传统产业呈现出“缓慢收缩”而非“急剧萎缩”的特征，恰恰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与飞跃性的辩证统一。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是扬弃关系，新兴产业为传统产业提供智能化改造的技术手段，传统产业中被证明有效的要素被保留并升级，低效部分则被淘汰。

从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来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持续加速，“新兴产业扩张、传统产业收缩”的格局日益清晰，但新兴产业尚未完全替代传统产业的支撑功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新旧统筹”，根据不同区域的产业基础，制定差异化的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节奏，防止“一刀切”地弃旧迎新。

3. 创新主体层面

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落到企业这一微观主体。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生产力发展中的职能分工，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公有制企业承担战略性、长周期创新，民营企业主导竞争性、短周期转化，外资企业提供技术溢出与国际市场接口，这种功能分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

民营企业已成为创新绝对主体。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研发费用达1.13万亿元，研发人员115.17万人，平均研发强度2.77%；全球研发投入1000强中112家为民企，平均研发强度7.42%^①。这表明民营企业在应用型创新和市场化转化中具有效率优势，但其研发投入高度集中于短周期、高回报领域，对基础研究和“卡脖子”技术的投入意愿不足。国有企业是战略科技力量核心载体，2025年央企研发投入1.1万亿元，强度2.86%，拥有国家级研发平台474个^②。国有企业在原始创新和战略性技术攻关中承担国家战略支撑职能，但其行政化考核机制与长周期、高风险的技术突破之间存在矛盾，容易导致“重立项、轻转化”的资源配置扭曲。

独角兽企业引领前沿方向，2025年达416家，总估值约1.6万亿美元，占全球30%，其中人工智能领域69家^③。独角兽企业是新兴技术走向商业化的先行主体，但其高估值往往伴随资本泡沫风险，且区域分布高度集中于东部少数城市，对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外溢有限。外资企业则是开放创新的重要参与者，2013~2023年外资工业企业研发经费从2015.1亿元增至3757.6亿元，有效发明专利从7.5万件增至32.7万件，在华外资研发中心超1800家^④。外资企业在带来技术溢出和国际市场连

① 数据来源：全国工商联（2025），《202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https://www.chinadevelopment.com.cn/news/cj/2025/09/1958752.shtml>；全国工商联（2025），《2025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https://www.cnipa.gov.cn/art/2025/9/29/art_55_201832.html。

② 数据来源：国务院国资委官方网站。

③ 数据来源：中关村独角兽企业发展联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科技与标准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等（2026），《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2026年）》，https://www.stdaily.com/web/gdxw/2026-07/21/content_550735.html。

④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24），《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未来共赢发展再起航》，2024年年度报告，https://www.caitec.org.cn/n5/sy_gzdt_ldhd/json/6836.html。

接的同时,也存在核心技术封锁、研发本土化程度不足等问题,其创新活动与国内产业链的融合深度有待加强。

总体来看,国有企业聚焦原始创新与战略突破,民营企业主导应用创新与市场转化,独角兽企业引领前沿赛道,外资企业提供全球化协同支撑,这种分层递进、功能互补的主体格局,既是我国创新体系韧性的体现,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多路径生成提供了组织基础。然而,不同主体之间也存在激励错配、成果转化壁垒、区域分布极化等深层矛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根据不同区域的所有制结构特征,分类引导各类主体协同创新。如在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城市群,重点激发民营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活力;在辽宁、黑龙江等东北部地区,强化国有企业的攻关职能并打通其成果转化通道;在中部地区,则需通过政策引导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技术适配与本地化再造。

(三)结构性失配导致的困境

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差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具有深层次的结构成因。

1. 区域差异持续扩大

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东部引领、中部和东北稳步转型、西部追赶”的格局,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仍在持续拉大,后发地区即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劳动力,也难以有效吸收先进地区的技术溢出,深层原因是存在资本积累与技术作为一般生产力的不均衡分布之间的结构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循环时强调,“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①。然而资本积累总是趋向于利润率最高的部门与地区,并通过竞争迫使落后资本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因此,在“技术-产业-人才”正反馈机制的驱动下,发达地区凭借先发优势形成资本的技术构成持续攀升的良性循环,高端人才持续集聚、研发投入不断加大、产业配套日趋完善。在现实发展中,后发地区若要有效吸收先进技术,需同时具备高技能劳动力储备、专业化配套产业链、制度吸收能力。这三类资产在后发地区普遍缺失,加之交通通信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缩小区域差距,反而使后发地区本已稀缺的高技能人才随技术引进项目一同流向发达地区。实证研究显示,这种极化效应并非个案,而是呈现出系统性的空间分化特征,表现为新质生产力的空间网络布局已实现从离散状态向集聚形态的系统性重构,宏观上形成了东稠西疏的“核心-边缘”格局(徐蔼婷等,2025)。长此以往,区域差距不仅不会自然收敛,反而可能因虹吸效应而持续扩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自发实现空间发展的平衡,必须通过有为政府克服资本盲目追求剩余价值所带来的资本两极化分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正是要求在全国一盘棋中统筹区域布局,通过制度供给引导资本流向后发地区,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473页。

2. 创新链条存在结构性断裂

从现象层面看,我国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转化通道并不通畅,高校院所的大量科技成果在完成实验室验证后往往停滞不前,中试放大作为从原理验证到规模化生产的过渡环节,是创新链条中最薄弱的节点。这一断裂不能简单归结为组织协调的失灵,其深层根源在于在科技从知识形态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生产关系的不适配与价值实现通道的不畅通。

科学在生产体系中需要经历从知识形态到技术形态再到资本形态的转化过程。科学与生产的结合是一般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关键环节,这一转化有赖于资本的积极参与。中试环节处于尚未成熟、资本又不愿率先进入的过渡地带,在剩余价值生产的驱动下,产业资本更倾向于投向回报周期短、市场风险可控的应用环节,对于失败率相对较高且投入规模为实验室研究数倍的中试环节,资本的选择是理性地保持观望。中试环节的缺失,使科技成果滞留于半成品状态,无法进入社会生产体系以真正实现其使用价值,不仅导致研发投入浪费,更深层的影响是导致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技术、产业与价值之间的循环无法顺畅运转,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整体跃升受到制约。

创新链条断裂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尚未完全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制度层面为新质生产力的成长提供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支撑。

3. 要素流动存在壁垒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开放式创新,要求人才、数据、技术、资本等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然而,现行体制下各地出于财税、就业与政绩考量,倾向于将要素留存在本行政区域内,数据共享不畅、技术市场条块分割,要素难以依照效率最优原则跨区域流转。这一壁垒的深层根源在于生产要素的属地化分割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要求之间的根本性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循环时强调,资本“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停滞的资本部分的总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①。类似地,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要素循环,要求人才、技术、数据、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完成“配置—使用—增值—再配置”的完整循环。新时代新质生产力要素的社会化程度远高于传统生产力,如数据的跨区域流动、技术的跨省转化、研发团队的异地协同,都要求突破行政边界的束缚。现行生产关系在空间组织上呈现鲜明的属地化特征,地方政府依托行政权力对辖区内企业、人才、数据资源形成了实质性的控制力,成为要素跨区域配置的制度性屏障。要素流动壁垒的存在,使得要素循环被割裂,出现人才被户籍锁定、技术被地域封锁、资本被地方截留等现象,结果不仅是整体配置效率的损失,更是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社会化生产格局难以形成。破解这一矛盾,必须从改革财税留成比例、建立跨区域税基共享机制、推行技术资格跨省互认等制度重构入手,使要素配置的权力边界从“行政区”转向“经济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20页。

能区”。

4. 同质化发展风险突出

教育、科技、人才三大领域的政策在不同区域差异显著,政策效果高度依赖于区域基础条件。现实中,面对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许多地区在政策制定时倾向于模仿先进,直接复制发达地区的产业规划、人才政策、创新平台方案等,忽略了不同区域在发展阶段、产业基础和制度上的差异,从而导致各地都在争抢“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热门赛道,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等问题。同质化风险的根源在于政策实施和区域实际的不适配,以及竞争性市场结构内生的盲目性。

“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①。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地方政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行为,由于缺乏成熟的评估指标与分类指导方案,地方在追求经济价值的驱使下,复制先进地区的政策成为最便捷且风险最低的选择。这种模仿行为虽然在个体层面是理性的,但当大量地区在同一时间、同一方向上作出相同选择时,便造成了类似马克思所批判的盲目竞争后果,如产业布局高度雷同、资源在低水平上重复配置。从另一方面看,产业政策制定本身是一项需要专业判断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的经济活动,但当其被纳入政治考核,参与到横向比较之中时,便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因地制宜的理性轨道,使得政策供给与本地实际严重脱节。破解这一困局,必须认识到同质化风险是竞争性结构在特定制度环境下产生的系统性偏差,根源在于尚未形成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差异化激励与分类指导机制。因此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对这一要求进行回应,通过建立区域差异化考核机制、编制分类指导清单、强化自上而下的政策统筹,从制度源头引导各地从模仿竞争转向错位协同。

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分类与方法论

上述困境分析表明,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问题,根源在于“一刀切”的发展模式与区域客观条件之间的错配。为突破单一经济水平分层的局限,可以将创新要素密度、产业基础厚度、制度开放度三重因素作为分析框架,对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量化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原则。

(一) 区域分类

1. 指标体系

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地区、产业和主体三个层面呈现出显著的梯度分化与功能互补格局。为将“因地制宜”从政策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分类框架,选取“创新要素密度”“产业基础厚度”“制度开放度”为主要指标(见表1),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地区产业结构与创新主体,构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标体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68页。

创新要素密度对应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中“不变资本”的技术含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①。一个区域 R&D 经费投入强度和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衡量其资本技术构成水平的最直接观测指标，前者反映资本在知识生产环节的投入规模，后者体现知识生产转化为技术成果的累积效应。

产业基础厚度对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资料部门的完整性与规模。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分别从“产出结构”和“主体规模”两个维度衡量一个区域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水平。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反映产业结构中物质生产部门的地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体现生产资料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与配套能力。

制度开放度对应生产关系的空间开放程度。生产关系不仅是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还包含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其空间形态直接影响生产力的效率。非国有经济占规模以上工业营收比重反映所有制结构的市场化程度，省际技术合同成交额则直接衡量区域间技术交换关系的活跃度，二者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产关系在空间维度上的开放性与流动性。

表 1 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标体系

维度	理论内涵	观测指标	指标权重
创新要素密度	资本技术构成的空间分布	R&D 经费投入强度(%)	50%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50%
产业基础厚度	生产资料部门的完整性与规模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5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家)	50%
制度开放度	生产关系的市场化与开放程度	非国有经济占规模以上工业营收比重(%)	60%
		省际技术合同成交额(亿元)	40%

注：本文在确定各维度权重时，主要依据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发布的《新质生产力企业评价指南》(T/GBA 056—2025)。该标准构建了包含 9 大核心要素、19 项细化指标的三级评价体系，重点考察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鉴于该标准代表了当前新质生产力评价的前沿导向，本文借鉴其核心逻辑，将“创新要素”与“产业基础”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赋予较高权重(各 50%)；同时参考其关于“要素优化组合”的论述，引入“制度开放度”作为生产关系层面的调节变量。

2. 测度方法

第一，采用位次赋分法将各省指标标准化。由于各指标量纲不同，无法直接相加。本文采用位次赋分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每一指标的原始数据转换为 0-100 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版，第 707 页。

间的无量纲分数。设参与分类的省份总数为 $N = 31$, 对于任一指标 j , 将 31 个省份从高到低排序。若某省份在该指标上排名为 R ($R=1$ 为最高, $R=N$ 为最低), 则得出该省份在该指标上的得分 S_{ij} 。

$$S_{ij} = \frac{N - R}{N - 1} \times 100 \quad (1)$$

其中, i 表示省份, j 表示指标。

第二, 计算各省份在 3 个维度每个指标上的得分。设某省份在某一维度 k 上的得分为 D_{ik} , 计算该省份在该维度内各指标得分的加权平均值。

$$D_{ik} = \sum_{j \in k} w_j \times S_{ij} \quad (2)$$

第三, 计算三个维度得分的加权和, 即某省份的综合得分 T_i 。

$$T_i = \alpha \times D_{i, \text{创新}} + \beta \times D_{i, \text{产业}} + \gamma \times D_{i, \text{开放}} \quad (3)$$

其中, $\alpha = 0.4, \beta = 0.35, \gamma = 0.25$, 分别为三个维度的权重, $\alpha + \beta + \gamma = 1$ 。权重设定的依据为: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创新, 故创新要素密度权重最高; 产业基础是新技术落地的物质载体, 权重位次紧随创新维度; 制度开放环境作为适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支撑, 权重相对偏低。

3.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 31 个省(区、市)作为研究区域(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不包括港、澳、台)。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25》《中国统计年鉴 2025》《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2025》及全国技术合同登记系统 2024 年度数据。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年鉴收录的均为 2024 年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数据, 这是截至 2026 年 6 月可获得的最新完整年度数据。对于部分缺失数据, 采用插值法进行填补处理。

4. 分类逻辑与分类结果

基于前文构建的新质生产力测度指标体系, 分类逻辑为综合得分定区间, 结构特征定类型。第一, 按综合得分划定类型区间。将综合得分从高到低排序, 参照自然断点, 初步划定各类别的分数区间。这一步不预设各类别省份数量, 而是根据数据本身的分布特征确定边界。第二, 结合结构特征进行微调。综合得分只是初筛, 最终类型归属需要结合各省在三个维度上的结构特征进行判断。具体而言, 若某省的三个维度得分结构与同分数段其他省份存在显著差异, 则需结合地区产业结构与创新主体, 依据其最突出维度的特征进行归类, 将我国 31 个省(区、市)划分为五类区域(见表 2), 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差异化政策。

表 2 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区域分类表

类型	产业结构	创新主体	主攻方向	地区代表
前沿 创新型	新兴产业占主导, 数字经济、高技术制造业比重大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强, 独角兽企业活跃, 外资研发中心密集	原始创新、未来产业、标准制定	广东、浙江、上海、北京

续表 2

类型	产业结构	创新主体	主攻方向	地区代表
产业升级型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存,高技术制造业占比中等	大中型企业研发机构完善,专精特新企业较多,国企民企协同	智改数转、新兴产业集群培育	江苏、天津、山东、安徽、福建
战略支撑型	重工业、装备制造业占比高,承担国家战略任务	央企和国企主导,研发投入强度高但市场化转化能力弱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军转民、央地协同	陕西、四川、辽宁、吉林、黑龙江
承接转移型	传统制造业占主导,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新兴产业逐步布局	中小企业为主,创新主体数量少但增长快,内外资企业并存	产业链延伸、技术吸收转化	湖北、湖南、重庆、江西、河南、河北、山西
资源依托型	资源加工型产业占比高,新兴产业起步晚	企业创新活跃度低,研发机构少,本地高校科研力量弱	绿色能源、特色产业、生态价值转化	宁夏、广西、云南、内蒙古、甘肃、贵州、新疆、青海、海南、西藏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注:(1)江苏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是产业升级引领,而非原始创新策源地,这与北京、上海存在质的区别。(2)区间边界存在交叉并非方法论上的缺陷,而是由分数与结构两个维度的不同功能所决定的。以陕西为例,其处于战略支撑型和承接转移型分数区域内,但其承担着国家航空航天、军工装备等战略任务,国企占比高、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按功能定位归为战略支撑型。类型划分始终服务于因地制宜的政策导向,不同类型的区域需要不同类型的政策供给。

(二)方法论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指引,遵循科学方法论。

一是要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核心要义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摒弃“一刀切”思维,坚决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评估自身发展条件,根据本地的客观条件,坚持从实际出发,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实现稳中求进,让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更贴合本地实际,更具可持续性,切实将其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能。

二是要坚持新旧统筹,协同发展。传统产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承载着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与庞大的就业体量,绝不能被简单等同于落后产能。坚持新旧统筹,就是要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引领,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链条改造,推动其向高端化、品牌化跃升。同时要坚持“立”“破”并举,同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形成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壮势、未来产业布局的协同格局。各地需立足自身禀赋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结构,让新旧动能优

势互补,共同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坚实基础。

三是要坚持底线思维,防范风险。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若脱离地方实际盲目跟风,极易引发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与资源错配等问题,损害区域经济稳定,导致经济风险。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增强忧患意识,统筹发展与安全,科学研判,理性规划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布局。各地需健全风险预警与防控机制,在培育新动能的同时守牢安全底线,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既充满活力又稳健有序,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于实施“分类治理”,针对不同困境类型设计与之匹配的策略,将“因地制宜”从一个政策原则,上升为可操作的实践框架。

(一)构建分级分类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建议》指出,“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②。“十五五”期间必须立足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底与创新承载力,构建适配区域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打造定位清晰的区域创新体系。

对于前沿创新型区域,区域发展要以原始创新策源地与国际科创中心为目标,从侧重规模化研发投入转向优化创新生态、深化开放协同,持续夯实原始创新根基。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加码基础研究,力求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突破。在此基础上,依托人才、资本、数据等高端要素集聚优势,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如北京中关村协同创新网络、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深港穗创新集群等实践成果,充分印证了多链融合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可行路径。此外,需以制度创新为先导,探索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优化科技金融生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对于产业升级型与战略支撑型区域,应聚焦制造业短板,开展产业链定向攻关。在促进成果转化方面,利用区位优势与市场优势,积极承接先发地区的技术溢出和成果转移,重点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在深化数智赋能方面,可围绕本地区主导产业,大规模推广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造,推动传

① 习近平(2025):《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求是》,第22期,第4-10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版,第30页。

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如江苏通过“智改数转网联”行动,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山东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创新金融产品支持技术创新,为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供了有力的要素保障。在培育特色集群方面,结合本地产业基础,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对于承接转移型与资源依托型区域,应避免盲目复刻高端研发体系,构建“引进—适配—再造”的渐进式创新路径。在发挥资源转化优势方面,需立足能源、矿产、生态等区域特色,发展资源精深加工和绿色能源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如贵州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打造算力产业高地,有效带动了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活力回升,2025年地方GDP增长5.6%,有力印证了特色资源与国家战略结合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面,应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结合本地实际进行适应性改造,培育本地创新主体。此外,还需补齐基础短板,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改善创新生态环境,以吸引外部人才和技术流入,逐步构建局部创新极点,夯实产业基础、优化创新生态。

(二)健全分类施策的“两新”深度融合机制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①。推进“两新”深度融合,必须立足五类区域的差异化特征,构建分类施策的融合机制。

一是确立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的差异化路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前提是遵循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质,融合的方式包括渗透融合、交互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等多种形态,不同区域的产业技术基础决定了哪种融合形态应居于主导地位。前沿创新型区域应聚焦交互融合,依托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在前沿领域实现从0到1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并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技术向制造业、金融、医疗等领域渗透扩散,以“基础研究—技术开发—规模化应用”的通道实现科技对产业的源头驱动。产业升级型与战略支撑型区域应聚焦延伸融合与重组融合,以数智技术对传统产业链进行改造,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的数字化升级,形成新的产业形态。承接转移型与资源依托型区域则应聚焦“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依托产业梯度转移通道承接先发地区的技术溢出,并围绕本地特色资源禀赋开展适宜技术的本地化适配,避免盲目追逐前沿技术。

二是构建产业创新反哺科技创新的需求牵引机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基础在于广泛的产业需求和应用场景,产业实践中产生的技术需求通过逆向传导至科技创新环节,促使科研方向调整与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型与战略支撑型区域的创新需求为大规模生产场景的中试验证需求,将生产一线的技术瓶颈、工艺缺陷提炼为科研课题,通过“揭榜挂帅”机制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定向发布,使科研

^① 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3月版,第523页。

方向从论文驱动转向问题驱动。承接转移型与资源依托型区域为技术适配需求,这类地区往往存在技术不适用、成本过高、环境约束等问题,因此以技术适配为需求,要求科研机构围绕本地资源禀赋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研发。前沿创新型区域为场景验证需求,依托新兴产业为新技术提供“首试”机会,使前沿技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完成升级。需求牵引机制的有效运行,能够将区域产业实践中的真实问题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动力,推动本土新质生产力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价值创造。

三是构建差异化融合机制。前沿创新型区域的融合核心在于源头发力,应围绕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建立激励机制,扩大财政科研经费实施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支配权,降低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门槛。产业升级型与战略支撑型区域的核心在于企业,应强化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由行业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企业提出的产业技术需求开展定向攻关。承接转移型区域的核心在于平台,重点建设技术转移中心和共性技术服务平台,通过技术交易市场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使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在平台上高效对接。资源依托型区域的融合核心在于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应用目录和财政补贴等政策,降低企业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和风险,引导绿色能源、循环经济等适宜技术落地。差异化施策使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从一个模板走向多种形态,最终形成科技驱动产业、产业反哺科技的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三)加强跨区域要素交易市场建设

创设跨区域要素权益交易市场,是破除行政分割、地方保护,破解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流动壁垒的关键制度安排。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出于财税、就业与政绩考量,倾向于要素本地化留存、技术市场封闭、数据资源不共享,导致创新要素难以按效率最优原则跨区域配置,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区域协同创新。

一是搭建省级联动、全国贯通的跨区域要素权益交易平台。纳入技术成果、知识产权、科研人才服务、产业数据使用权等交易品类,建立统一交易规则、估值标准、登记确权与权益分配制度,实现要素商品化、权益化、可交易化流转。健全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利益共享机制,明确技术输出地与产业落地地增值收益分成比例,鼓励前沿创新型区域成果向承接转移型、资源依托型区域梯度转化,改变技术一次性买卖模式,形成长期协同、收益共享的合作格局。

二是推行跨区域技术资格互认与数据流动互认,降低要素跨区域配置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行专业技术资格、职称评审等级跨省互认,放宽科研人员柔性流动、异地攻关限制,允许高端人才以技术顾问、短期挂职、项目合作等方式服务后发区域发展。建立跨区域数据要素共享与权益补偿机制,规范行业数据、企业数据双向流通规则,对数据供给方给予合理权益补偿,打消地方数据保护顾虑。设立跨区域协同创新产业基金,引导资本沿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布局,以市场化权益交易

替代行政干预,推动要素从局部固化走向全域优化配置,从根本上消解区域要素流动壁垒。

三是搭建一体化跨区域科创服务体系,夯实要素流通与协同合作的配套支撑。长期以来,跨区域科创服务存在主体分散、标准不一、衔接不畅等问题,难以适配要素跨区域流转需求,从而增加区域协同创新的成本与难度。因此,可统筹整合不同区域间科创服务资源,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综合服务枢纽,集成技术经纪、知识产权代理、投资对接、项目管理等全链条服务,统一服务规范与办事流程,为跨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提供一站式保障。此外,还可建立跨区域科创服务协同监管机制,厘清不同地区监管权责,完善服务评价与信用管理体系,规范市场运行秩序,持续巩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运行基础。

(四)实施差异化考核与分类指导

针对同质化发展风险,必须改变“一刀切”的考核方式,建立与区域功能定位相匹配的评价体系和指导措施。

一是要建立区域差异化考核机制。各地必须打破单一导向,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与区域功能定位相匹配的差异化考核机制(见表3),用分类考核替代“唯GDP论”,使不同地区在各自的功能定位上各展所长、各得其所,从制度源头引导各地走特色发展道路。

表3 五类区域新质生产力差异化考核指标

区域类型	核心考核指标	弱化指标
前沿创新型	PCT专利年增长率、技术交易净收入、新设未来产业企业数、基础研究占R&D比重	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产业升级型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速、工业机器人密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单位GDP能耗下降率	招商引资总额
战略支撑型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率、军转民技术合同成交额、央地协同攻关项目完成率	出口额
承接转移型	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速、产业链配套率、园区单位面积产出增长率	房地产投资占比
资源依托型	生态产品总值(GEP)增长率、非常规能源发电占比、绿色技术应用数量	工业增加值增速

注:本文差异化考核指标的选取主要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并深入贯彻了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核心原则。核心指标侧重于反映各区域在国家创新链与产业链中的特定功能定位,弱化指标则旨在破除传统“唯GDP论”的路径依赖,纠正资源错配与同质化竞争。

二是要编制“区域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清单,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制定精准的负面清单与鼓励清单,实行分类引导。负面清

单应明确划定发展底线,严禁资源依托型区域依托资源优势盲目布局高耗能、高排放的低端制造项目,杜绝重走粗放式发展老路;约束前沿创新型区域发展导向,遏制单纯炒作科技概念、脱离实体产业的乱象,防范科创领域出现发展泡沫。鼓励清单则应精准匹配区域功能定位,为承接转移型区域制定产业链配套目录,引导其围绕长三角、珠三角龙头企业的供应链缺口进行精准补缺,重点发展精密零部件、特色原材料等中间品;为战略支撑型区域制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目录,聚焦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集中资源突破技术瓶颈;为资源依托型区域制定绿色技术应用目录,优先支持风光储氢、节能降碳、循环经济等适宜技术落地。通过分类清单的制度化供给,使各区域在清晰的政策边界内寻找自身定位,从源头上遏制盲目跟风与无序竞争。

三是要强化自上而下分类政策指导。国家层面应依据五类区域的功能定位,出台差异化的产业布局指引,从源头遏制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热门赛道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禁地方政府简单复制发达地区的产业规划、人才政策与创新平台方案,建立政策备案与评估机制,对脱离本地要素禀赋、盲目跟风的政策项目及时予以纠偏调控。同时,健全区域对标与错位发展的引导机制,鼓励同一类型内部不同省份或城市进一步细分赛道,如产业升级型区域可分别在智能制造、绿色化工、高端纺织等方向形成特色,避免同一类型内部同质化竞争。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与方向指引,形成各扬所长、互补协同的发展格局,从制度源头化解政策错配与同质化风险,引导各地树立和践行适配区域实际的正确发展导向。

参考文献

-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版。
-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版。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
-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
- 任保平、陈婧文(2026):《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与策略》,《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阮一帆、王智博(2025):《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内涵意蕴与实践进路》,《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徐蔼婷、代宇杰、刘震(2025):《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统计测度、动态演进与关联网》,《统计研究》,第10期。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Line with Local Conditions

GONG Yun^[a] MENG Hong^[b]

a.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b.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Summa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carrie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s a core methodology, this approach embodies Marxist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e underlying logic rests on the premise that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must align with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t present,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characterized by overall advancement,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ition. Nationwide indicators show steady improvement. However, this progress masks significant spatial imbalances. Developed eastern regions have established self-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s, whil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truggle to absorb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due to shortages of high-skilled labor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

These patterns are faced with deep challenges. First, the regional gap continues to widen. Second, structural ruptures exist in the innovation chain, particularly in the pilot-scale phase. Third, barriers hinder the cross-regional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Fourth, homogenize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leads to redundant construction 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ree scientific methods should be adhered to: proceeding from reality, coordinating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maintaining a bottom-line mindset. These principles translate into actionable pathways: establishing a tiere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setting up cross-regional factor markets,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assessment mechanisms.

By pursuing these pathways, a regional innovation pattern featuring distinctive advantages will take shape, elevating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from a policy guideline to an operable practice framework.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ddressing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voiding homogenized competition, and refin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In Line with Local Condition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gional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B14; O30; R10

(责任编辑:周莉萍)(编校:王 瑶)